一篇拾遗补缺的帐

——新编《绵竹县志》（近代部份）

张容光

偶尔读李商隐过陈琳墓“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诗句时，忽然联想到五位同室编修县志的老友都已不在人间了，引起我无限的惆怅。同时又联想起几月前有人提及“政协新编《绵竹县志》（近代部分）未署编委姓名，特别是那些曾为编修县志付出心血的人，不应埋没无闻”。为此乘兴写了这篇回忆，一则藉此纪念老友，再则可以拾遗补缺。

绵竹有志由来已久，因时事变乱，典册散亡，自明代以上已无书可考。今天能见到的只有清康熙四十四年时县志胶卷和残篇断册的清嘉庆、道光两个版本，完整的尚有民国八年县人黄仲生领导编的县志。

解放后万象更新，一九六二年初，县委领导响应中央号召，由县长刘津海倡议，认为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竹县志已有四十多年缺乏记载，历史不能中断，应趁亲身见闻者健在，及时抢救资料，进行编修工作。是后在当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县政协樊廷楠、张容光、魏明高向县人民委员会建议，提出成立绵竹县志编委会及成员名单，经过讨论通过。其组成人员如次：主任委员刘津海，副主任委员樊廷楠、姬镇宣、郝尚光、陈世芳、李平石、张容光、魏明高、张伯乾；委员：曾立基、王家让、阎法顺、王明元、陈宝奎、王听如、雷苗生、封体仁、张昌文、向修才、吴家慧、熊安民。

随后又组成了编写班子，其人员有郑本贻、赵久斋、何励精、程鸿儒、王元勋、江进之、章治安、熊光福、王襄、徐鸣刚、王运祥、周杏传、江狎鸥、曾令华、方云、方免尘、章璞、王耀天、刘士魁、赵云章、邓维俊、黄宗厚、李吉甫。

经过一段摸索实践，而后于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决定县志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分工：

1、大事记，姬镇宣、陈宝奎、刘士魁、张伯乾、张容光。

2、农业篇，任经畬、王德富、蔡及刚、

杨心周。

3、工业篇，周子元、封体仁、封锡之、周杏传。

4、商业篇，孙海林、曾立基、魏明高、张介卿。

5、教育篇，雷苗生、姜敬沉、章璞。

6、地理篇，郑本贻、唐礼藩、郝淑琼。

7、宗教篇，樊廷楠、张容光、周杏传。

8、医卫篇，阎法顺、程鸿儒、王襄。

9、人物篇，李平石、张容光、章治安。

10、文艺篇，黄宗厚、张昌文。

分工是明确了，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大多数负责同志因具体工作，除开会来参加外，很难兼顾县志工作。虽然每组有几人，实际上每组只有一人下水，他们是任经畬、封锡之、魏明高、章璞、郝淑琼、周杏传、王襄、张容光、章治安、张昌文。而这些人中自始至终（第一期）坐下来的人，又只有封锡之、周杏传、章治安、章璞、张容光，后来还加了安叔志。王襄、任经畬、郝淑琼三人是在单位编写，张昌文是第二次恢复才来会的。容光当时既是民选副县长，又是县政协副主席，所以

编委会和编写班子都有幸参加。我是爱好文史的，很乐意参加。参加后，也刻苦钻研，认真学习，认真工作。尤其使我不能忘怀的，首先是党政领导重视与支持，表现在财力上、人力上有求必应。其次编写人员都是绩学之士，大专人才，有丰富阅历，有写作水平，他们是安叔志（外专毕业，我的老师）、封锡之（川大毕业）、章璞（北师大毕业）、周杏传（专科）、张治安（大学）、江狎鸥（国学院）、魏明高（大学），他们都虚怀若谷，勤学好问。我对这项工作认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学习、切磋磨砺的机会。我们对编志工作是充满热忱的。虽然编写县志对我们来说都是生手，但学习实践为我们打破了难关。俗话说得好，世上无难事，只在有心人。

工作开始，我们的次序是：一、拟编修县志缘起；二、建立组织机构；三、研究决定县志内容和起讫时限；四、学习有关文件、文献，提高认识，扩充知识；五、分别编写各篇提纲；六、根据提纲收集资料；七、各就所长，分工编写，集体研究，补充修改；八、油印初稿送编委审定。最后这一工作是由办公室曾世清负责

分送的。在这里我主要谈一下起讫时限和分篇内容：我们的任务是编修近代史部分即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段时间绵竹各项史实。至于内容最初提法不一，是通过学习而后决定的。学习的内容主要有理论性文章，如《红旗》杂志所载马恩列斯论评价历史人物有关论述，及翦伯赞、白寿彝的史学论文，吴晗有关历史问题的文章，章实斋《文史通议，修志十议》，刘知几《史通·叙事篇》和一些新旧方志。如《湖南新省志、大事记》、《石首县志》、《孝感简志》、《咸宁简志》、《四川通志》、《富顺县志》、《德阳县志》、《松潘县志》、《宛署杂记》等。对内容范围当时尚乏具体提法，我们基本上是参考了湖南省志分类和我县解放前的实际情况，定为十二部分，即概述、大事记、人物、地理、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医卫、交通邮电、文艺、宗教（其中概述、交通邮电是后来增加的）。内容定后即编拟提纲，经编委审批，印发征稿通知，送交有关部门，随即开始查挡案，走访联系，收集资料。由于挡案当时还未整理，大部在尘封之中，查翻异常困难，犹海里寻针，加之对各乡征文也一无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获。除少数查档资料外，大部分素材都来自登门拜访，座谈纪录和函件索取。函件有的发至北京、甘肃、兰州等地。

关于编写办法，我们是共聚一堂分篇负责（如教育章璞，工业封锡之，商业魏明高，宗教周杏传，地理郑本贻（一期未到由郝淑琼代理），人物章治安，大事记张容光，文艺张昌文（一期未到会只写有提纲）。（安叔志则兼大事记人物的补充和缮抄稿件工作）。我们形式上是分工，实际上是合作。每稿写出后基本上都是经过互相探讨的，充分表现了和衷共济的精神。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除文艺篇外，其它各篇都程度不同地完成百分之五六十至百分之八九十，有的已油印成册，分送有关编委进行初审，如大事记送张伯乾，人物篇送李平石、樊廷楠，医卫篇送阎法顺等。计共用经费三百余元，用途是一部分补贴无固定工资收入人员如安叔志、章璞，一部分用于纸张笔墨油印等。已写成稿件约二十余万言。平心而论，是尽可能作到了抢救资料工作。其后编修工作因事中辍。复经“文化大革命”，绵竹政协机关不复存在，更谈不上县志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政工作进入正轨。一九八一年当县人代、政协两会复开之际，县委薛明书记在会间指定了张容光及张昌文负责恢复县志编修工作，要求要善始善终，完成任务，并在以往基础上，充实编委。由县委决定主任委员王彪，副主任委员张容光、张伯乾、张方楷、孙海林、魏明高、张昌文、肖祖何；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听如、邓治河、叶宣文、任经畬、宋平、陈世芳、陈宝奎、程鸿儒、苏鎏奎、郑本贻、姜敬沉、封体仁、黄宗厚、彭宗涛。并及时拨出经费二千七百元。在县委领导热情关怀下，县志工作又重新开展。惟是项工作已中断近二十年，原有编写人员已大部死亡（如原编志室的六人中章治安、章璞、安叔志、封锡之、周杏传都去世了，只张容光还在），乃另聘请人员充实。除由张容光、张昌文总其成，具体安排是郑本贻（县中史地教师）分任概述及地理，苟籍堪（汉中教师）协助，任经畬（原农业副局长）任农业篇，封体仁（原工交局副局长）任工业篇及交通邮电篇，姜敬沉（原文教局副局长）任教育篇，黄德明（原县中校校医）任医卫篇，魏明高（政协副主席）

任商业篇，曾烈承(原县百司工作人员)协助，王云舍（政协委员)、肖祖何（县委统战部长）任宗教篇，张昌文任文艺篇，杨茂生（老社会人士）协助，张容光任大事记及人物篇。工作次序为清理一九六三年原稿件，收集资料，学习有关文件，拾遗补缺，编写稿件，仍采用六三年办法，同住一个办公室内，既分工又合作。二次编修，除文艺篇及商业篇(商业篇原稿丢失了)必须全部新编外，其他各篇基本上是增补遗缺，改正错讹。第二次开展工作，条件比第一次更有利了，不仅县委领导经常关心过问编修工作，而政协内部又增加了党内强有力的领导同志，如王彪主席，董春发、曾立基、李治鑫等，他们进入政协后，各项工作都有很大改进和起色，因而县志工作也得到较快推进。例如王彪主席在当年七月十四日在研究县志工作后，他指定县志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除党中央及上级有重大布置外，这项工作不受任何干扰。因前些时由于多种原因，工作延宕。我曾写过一首诗给张昌文同志，题目是《与张昌文同志协商修改县志书怀》，内容如次："缅怀六三年，花甲正虚度。奉命修县志，光也骥尾附。朋侪

笔凌云，自愧初学步。匆忙历八月，草稿获半数。终因事蝟集，简编无复顾。十载板荡中，文化委衢路。一朝花柳明，中兴天大曙。民安乃右文，修志重宣布。又经数百日，基本足全数。复以审稿滞，改削难为助。春去夏又来，计划焉能误。合力排万难，同心磐石固。调整繁与简，去芜留精处，改正错与讹，文理求通疏。与子竭驽骀，期年完任务”。这是一个插曲。

二次编志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各项工作进入正常。特别是有了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绵竹县志（近代部分）把过去删掉的又加上了，如人物中的王干青烈士；过去不能写的也写出了，如傅春吾、夏骑风、马君弼等；过去无法肯定的，也肯定了，如绵竹和平解放史实。第二次编志工作时间又经过一年，绵竹近代史志部分基本写出来了。后以省委有文，修志工作正式由政府接办，我辈幸卸仔肩。但感编成之稿缺漏仍多，尚待贤能是正。我们高兴地看到，现政府新建编修县志班子，在大好形势下，人力、物力、财力，都十百倍于往昔，为时不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已陆续编成绵竹现代史志不少篇章，同时也充实了近代部分的不足，我们非常感佩他们。真正体现了盛世修志的宏伟气魄。千秋事业的完成近在目前，我们衷心祝贺胜利的到来。

一九八六年九月

绵竹中原书局开办始末

王邦济、吴慕虞等

绵竹中原书局，是在地下党领导创办的成都西川书局在川西各县、镇开办的第一个书店。

马识途同志在成都市图书事业志第三次咨询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当时搞地下党活动，主要是从知识分子入手，这是搞地下党工作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从知识分子、学生这里头来开始我们的工作，这些人的工作搞好了，就变成了桥梁，通过这个桥梁，我们就可以达到工农基本群众那里去。总的说来，以知识分子为桥梁，然后发展到工农主体，这是我们当时作革命工作的基本方法。做知识分子、做学生工作、做公教人员的启蒙工作，完全靠图书。因为当时国民党他们不能让你公开集会结社，只有通过这一点，就是书，就是用书来教育、发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手段"。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地下党所领导的西川

书局开办的第一个书店——“中原书局”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在绵竹城关小西街开张营业了。经理刘家农，付经理张孝先，董事长王秀岗。

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当时在广汉力生中学教书的进步教师礼广贵同当地的进步青年张孝先、蒙笳、周泽之等酝酿筹办传播革命、进步书刊的书店，特别是川西各县、镇。通过书店这个阵地，把党报、党刊及民主、进步书报输送到群众中去。这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人民民主运动，将起一定的作用。礼广贵将这个想法带到成都，向地下党员倪子明（当时是成都联营书店经理，受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四六年转川康特委，由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领导。）苏兮嶙（当时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工作，直接由林伯渠同志领导）汇报，得到倪、苏的完全赞同。倪子明将礼广贵等人办书店的事在青委刘光同志领导的青年组里作了研究，作为党的任务定下来，由倪子明同礼广贵直接联系。苏兮嶙也将礼广贵等人办书店的事向林伯渠同志请示，得到了林老的同意。于是，筹办书店的事，便积极地进行起来。

张孝先通过李平康（广汉城内一个小工商业者）结识了绵竹进步青年刘家农，刘对办书店积极响应，并表示愿意出力在绵竹办书店。刘家农幼年丧父，弃学习商，当时是德厚永山货店店员，在同兴永山货店也有一些股本。刘好学深想，曾读过不少革命书刊，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一九四四年冬，礼广贵、张孝先、李平康到绵竹与刘家农商定，在绵竹开办第一个书店。采取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公开募股，筹措资金。此后刘家农在黄家花园养病期间，其高小同学刘思才、王邦渭前来探视，刘借给他们一些进步书刊（有手抄、油印及正规出版物）阅读，有时也相与讨论时局，经数度往还后，刘即提出开办书店以便读书的想法，得到刘思才、王邦渭的赞同。刘又写信给在成都读高中的同学王邦济商讨办书店的事。寒假期中刘家农与邦济经几次长谈，对办书店取得一致意见。王在征得其伯父王秀岗同意后，即约礼广贵、张孝先来绵和王秀岗会面。礼、张把所拟的《章程》，其中包括“宗旨”、“股金”、“股东权益”、“董监事会”、“经理人员职责”、

"盈亏处理"条文（在起草《章程》时，"宗旨"一条颇费推敲，既要表达书店的进步性质，又不能锋芒毕露。此《章程》成为以后各店的兰本，惜已不存。）共商后，由礼广贵、王秀岗领衔，列二三十名发起人，写出募股启事，用白底红字石印印出。广汉由礼广贵在所教学生招募，陈德高、黄泽桂入股较多。绵竹由刘家农、王邦济出面串联亲友，入股数量虽多少不等，但积腋成裘，也居然为数可观。

王邦济、王邦渭弟兄为绵竹富户，均是学生，思想倾向进步。他家及其亲友认股较多。王邦济还将其小西街铺面两间让出，不取报酬作为书店门市部。弟兄俩还借出一些店堂及生活用具（长餐桌、藤椅、床、灶。）王秀岗毕业于成都高师，游学日本，学生时代（一九二〇）参加国民党，大革命时和共产党合作，积极参加绵竹的革命活动，受通缉逃亡，抗战期中返县，历任教职，时任绵竹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声望甚高，对办书店之事非常支持，是最合适的董事长人选，在开办书店期间，王确也起到了支撑和掩护的作用。

办店的基本条件：资金、地点、人事既已

具备，为了加速筹备，张孝先、刘家农分别放弃原有职业，全力以赴搞书店。刘负责当地应办之事，张则负责选购书刊，并请在广汉结识的重庆《新蜀报》记者，进步青年黄露含协助，从昆明、桂林、重庆、成都的“三联”、“国讯”、“联营”、“开明”等书店及文化供应社购进大批宣传民主、进步书刊及部分普及读物。

书店定名取自郭沫若在重庆主编的大型刊物《中原》，意在中原大地本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诞生摇篮，而今却陷于日寇铁蹄及“水、旱、蝗、汤”无穷灾难之中，要人勿忘中原，还我河山。名称既定，即托黄露含同志拜访郭老，请为题写店名，寄回绵竹后，在小西街刊成黑漆金字大匾。于是“中原书局”四个金字耀眼生辉，赫然在望。当在街边刊刻时，经常有不少群众围观，无不称赞郭老的道德文章和典雅流美的书法，同时也对书店寄予殷切的期望。

黄露含还请在渝的沈钧儒、马叙伦、茅盾、杨毅等知名人士为书店题写祝贺开业的条幅。礼广贵在成都请叶圣陶、丰子恺题赐了书画，经裱糊后高挂店堂，表明有许多民主老战

士对“中原书局”的祝贺和鼓励，除壮大声势外，也显示了书店的鲜明政治特色。可惜的是，所有牌匾、条幅今均散失无存，仅记得茅盾条幅内容为“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叶绍钧条幅为“嘉惠士林”。丰子恺条幅为七言绝句“家住夕阳江下村，一弯流水绕柴门，种得青松高于屋，留与青禽护子孙”。

由于系募股经营，互相串联，股友成份复杂，对于办书店的“宗旨”并非都衷心赞同。少许入股仅作人情，如当时的中城镇长巩超也入了股。因此，为了保证办店“宗旨”能贯彻始终，在股东中挑选倾向进步或政治上较为开明的人物组成一个良好的董监事会，就成为一项极重要的工作。经过慎重了解、选择，克服重重阻力，六月份在绵竹简师校内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一致推选王秀岗为董事长，刘家农、张孝先分任正付经理。发起人中的王邦济、王邦渭都列名董事，从而组成了当时条件下最佳的董监事会阵容。家具购置竭力从俭，仅新制书橱货柜各两个，小条桌一张。待一切就绪后，乃选择富于纪念性的抗战八周年——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开张营业了，使

僻静的小西街顿时热闹起来。除牌匾条幅不同凡响外，整个店堂简朴大方，书籍排列有序，琳琅满目，进入店堂如入阅览室。所经营的书籍、刊物、报纸都具有民主、进步的政治倾向。记忆所及，文艺作品方面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的俄国名著，有《母亲》、《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等反映苏联卫国战争及现实的作品。国内则有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叶圣陶的著作。刊物中最著名的有《文萃》、《观察》、《世界知识》、《民主周刊》，政治方面有《毛泽东印象记》、《延安归来》、《延安一月》、《西川漫》。理论方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的米夫《哲学基础》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评中国之命运》等。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则公开悬挂在门前树上，供群众自由阅读。通过苏兮嶙，书店墙上还挂有美新处出版的开罗首脑会议及反映反法西斯战争中各战场图片。（这些图片还定期更换，以后还张贴过日本军国主义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